

沈吕遂:延续宫巷26号沈家故事

本报记者 燕晓 见习记者 傅亦静



本期嘉宾

沈吕遂 沈葆桢六世孙、台湾资深制片人。曾担任《乔家大院》策划,代理张纪中版《水浒传》在欧洲版权推广。

为纪念沈葆桢巡台150周年,“沈葆桢巡台”史迹展近日在沈葆桢故居举办,沈家后代齐聚。沈葆桢六世孙沈吕遂,因此回到故乡福州。

沈吕遂自小在台湾长大,但三坊七巷里的家族印记深深刻在他的骨子里。

作为台湾资深制片人,沈吕遂希望通过拍摄电视剧《牡丹风云》,

将沈葆桢的故事搬上荧屏;

作为“翰林筵”餐厅老板,他将福州官府菜做到极致,在台湾传承闽菜文化并发扬光大;

作为沈葆桢后裔,他眷恋着故乡福州,多次来榕采风、参加侯官论坛、送楹联回沈葆桢故居……

这个福州话已经说得不大灵光的沈葆桢六世孙,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宫巷26号沈家的故事。



沈吕遂(右一)与其他沈家后人共聚沈葆桢故居。

本报记者 叶诚摄

重启电视剧《牡丹风云》

初见沈吕遂先生,72岁的他身材消瘦,身穿深绿色短袖 Polo 衫,头戴英伦风帽,举止间流露出艺术家气质。

沈吕遂自幼对影视艺术怀有浓厚兴趣,大学毕业便投身影视圈,在北京影视行业耕耘多年。其间,他与导演姜文合开影视公司,策划了经典电视剧《乔家大

院》,持有高阳《胡雪岩》三部曲的版权,代理过张纪中版《水浒传》在欧洲的版权推广。

在两岸影视文化界浸淫多年的沈吕遂,尽自己所能在推进两岸文化交流上做点事,这是他的心愿,也是他一直在做的事情。

如今,年过七旬的他仍然充满干劲。“我想通过拍摄影视剧的

方式,把自己祖辈的故事和台湾的历史记录下来,让更多人知道。”沈吕遂告诉记者,2000年左右他就开始筹拍电视剧《牡丹风云》,因种种原因,拍摄一度搁置。如今,他重启电视剧《牡丹风云》,意在还原“1874年日本以琉球船民在台湾被误杀为借口,发动侵台战争,沈葆桢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台交涉,成功使日本撤兵”的历史。

去年,他在福州不辞辛苦,寻访数月,在福建重组剧组,并将沈葆桢主持马尾船政的经历融入剧情中。

沈吕遂深情地说:“福州是中国海军梦启航之地,沈葆桢在福州总理船政,培养出一批批杰出的海军人才,这是我们不可忘却的历史。”

“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与沈葆桢在福州马尾设立船政,创办船政学堂。1874年,日本侵台后,沈葆桢带领船政学子驱日保台,这是船政学子首次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沈吕遂对那段历史如数家珍,在马尾船政的采风也让他有了新灵感。“未来我还想跟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的学生们交流,了解年轻人的想法,让电视剧的情节更加饱满。”

传承福州官府菜

有着艺术家气质的沈吕遂,还有过另一个身份——餐厅老板兼主厨。在台北繁华的仁爱路三段九号,他曾开设了一家名为“翰林筵”的餐厅,将福州官府菜的精髓与侯官文化、沈家历史巧妙融合,为食客带来味觉与文化的双重盛宴。

沈吕遂回忆,因祖辈来自福州,小时候家里宴请宾客,他经常进厨房打下手。“当时跟着外婆、奶奶做福州菜,对闽菜文化其实是没有概念的,只是动手来做,但久而久之就学会了。”沈吕遂说,后来在北京跟着侯宝林等大师尝遍了五湖四海各系菜肴,又时常听到别人介绍福州菜的典故,便逐渐对闽菜文化产生

兴趣,就想把小时候学到的福州官府菜传承下去。

这个想法在2011年落地。由于父亲中风卧床,沈吕遂不得不离开北京返台尽孝,闲暇时便开了这家以福州官府菜为主题的餐厅。“从最初的一两桌影视圈朋友,到后来的政商名流纷至沓来。”沈吕遂说,餐厅四年前就关掉了,但关注度仍然很高,因为这里吸引人的不仅仅是福州菜本身,还有沈葆桢家私房菜带出的历史故事。

福州的官府菜究竟有什么不同?“官府菜就是文人菜,文人遵循儒家思想,做人和做菜都要讲规矩。”沈吕遂介绍,“因为文人身份地位较高,经济

问题不在考量范围,追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由于这样的坚持,便形成了官府菜。”

佛跳墙是闽菜中首屈一指的传统菜肴,也是福州官府菜的代表。“其实佛跳墙应该叫福寿全,熬汤必须要全鸡全鸭全时,食材昂贵且工序繁琐。”沈吕遂说。

台湾菜和闽菜有何渊源?沈吕遂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台湾的饮食文化与福州一脉相承,如闽菜招牌佛跳墙在台湾备受欢迎,是喜庆宴会、年节餐桌上的主角。此外,台湾还从福州引进了许多特色食材,如橄榄、糟菜、红糟等,这些食材成为台湾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续写两岸故事

乡愁是什么?“虽然我自小在台北长大,但我的祖籍在福州,每次听到《茉莉花》,我都会想到我的家乡福州。”沈吕遂说。

在纪念沈葆桢巡台150周年之际,沈吕遂从台湾带来一份特殊的礼物——一副复刻的沈葆桢手书木刻楹联。这副楹联上书“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造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楹联的原版挂在台南的延

平郡王祠。

“沈葆桢初到台湾时,观察到台湾民间敬仰郑成功,所以上书清廷为郑成功建专祠,此举也是为了在外敌当前之际收拢民心。”沈吕遂说,“这次回来很感动,沈葆桢故居完成修缮,一砖一瓦,修葺如旧。我希望能把这副楹联挂在沈家老宅。”

回忆起第一次回福州的场景,沈吕遂还历历在目:“1994年初来福州,那时觉得这里好像还处于一个发展停

滞的阶段。现在,交通便利了,巷子宽了,绿化多了,古建筑和老宅子也保护得很好。”

面对福州的巨大变化,沈吕遂感慨万千,这些年来,他见证了这座城市的美丽蝶变。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从影视圈到餐饮界,沈吕遂的初心没有发生改变,他希望沈家留在福州三坊七巷的故事,能通过影视剧或者美味佳肴等载体传播出去。



沈吕遂在第十五届海峡两岸船政文化研讨会上发言。 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

小山村来了洋教授

本报记者 叶欣童

“看,那里就是文书中的‘鸭姆礁’吧?”

站在永泰县嵩口镇濂头村龙溪溪的一座小桥上,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中国历史学教授宋怡明遥指远处的水岸说。鸭姆礁是一个连本地村民都鲜少提及的地名,却因一箱契约文书吸引了国际学者的目光。

濂头村常住人口仅有百人,外国学者到访的场景在7年前还是新鲜事。如今,村民对此已习以为常。

初遇:寻找一箱“废纸”

2017年,宋怡明与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任郑振满应邀来到永泰考察历史文书,不在行程之中的濂头村阴差阳错闯进学者们的视野。从这里出发,宋怡明开始了一种全新历史视角的探索。

“郑教授、宋教授,好久不见,快进来喝茶!”入夏后的永泰烈日当空,濂头村村支书陈秋东在村部门口等了许久,终于迎来了两位老朋友——郑振满与宋怡明,同行的还有受邀前来调研的历史学专家们。

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口音,一群人却熟络地唠起了家常,回忆起在濂头村的点点滴滴。

“濂头是我开始永泰文书研究的第一站,在那里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历史文书,包含族谱、契约、陶器、账簿、

日用杂书等。”宋怡明还记得初次到访濂头时,当时正值暑期,村里的孩子们穿着睡衣好奇地一路跟着他们寻幽探秘。

好奇的不仅有孩子,还有为他们带路的陈秋东。“当时听说有厦门和美国的大教授来村里,只为一箱‘废纸’,我们都感到不可思议,这有什么特别的吗?”陈秋东说,当时只觉得教授们为人随和,后来才知道他们到村里是为了寻找民间文书,研究历史。

濂头村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山村,多少年来,它同大多数村庄一样在历史的洪流中寂寂无名。

“我们常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但不意味着‘失败者’的历史没有价值,永泰文书的价值就在于可以让我们恢复‘失败者’的历史,让我们从老百姓的角度去重新考虑中国历史。”宋怡明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曼纽尔·勒华拉杜里曾写就《蒙塔尤》,讲述13世纪法国南部一个偏远的山区历史,这本书后来成为整个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作品,也许关于永泰的研究也会成为他的“蒙塔尤”。

深入:为普通人“立传”

从2018年开始,宋怡明在哈佛大学开了一门叫作“中国民间文献阅读培训课”的选修课,把更多的永泰文书以及研究放到了课程里,其中当然

也包括在濂头村收集到的文书。

去年暑假,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中国历史学博士周晓睿第一次到濂头村,他也是中国民间文献阅读培训课的选修者。“课堂上,我们从濂头村的‘鸭姆礁’入手,看一块土地如何在不同的人手中流转,在不同的家族间被贩卖;接着我们看到村内的一个叫吴履人的佃农所签署的文书,分析他如何从佃农,一步步走向赤贫……用这些一手的历史资料,我们共同还原了普通老百姓的故事。”周晓睿说。

吴履人的经历是宋怡明每次提起永泰文书时一定会分享的故事,去年他和学生即超花了数月时间,通过二三十份从清朝康熙年间跨越到咸丰年间的永泰文书,重建了当地吴氏家族谱系。

“在濂头村,我们发现那里有相当一部分契约文书会讲到姓吴的人,但实际上现在的濂头并没有吴姓家族,他们去了哪里?”宋怡明说,通过契约文书里一笔笔的买卖记录和地方史料,他们发现了一个悲伤的故事:吴履人租田耕种欠下田租,陆续将自己继承的财产变卖,甚至把自家的粪厂(厕所)卖给人家,他的儿子吴仙海也远走他乡。这些历史文书,可让读者与一个死去100多年的人产生情感连接,意识到当时普通人生活的不易,引发现代人的共鸣。

令宋怡明更为印象深刻的是,在濂头村的一次田野调查中,他们发现水沟间一块不起眼的垫脚石,居然是清光绪年间陈氏族人为其母所立的墓碑,而墓碑主人的名字恰好出现在他曾经收集、阅读并在哈佛课堂上分享过的历史文书中。

在一次次走访、谈话中,宋怡明与濂头村、濂头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即便其中有数年他无法亲临永泰,他依然牵挂着永泰、濂头的历史文书,并通过线上方式与本地团队保持联系。不久前,宋怡明被永泰县政府授予“荣誉村民”称号,从洋教授变成村里人。“现在,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说‘咱们永泰了!’”宋怡明开心地说。

持续:传统智慧焕新

被濂头、永泰吸引的不只有宋怡明。上个月,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与哈佛燕京学社联合在嵩口镇举办“中国乡村研究的新资料与新路”研习营,来自哈佛大学、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厦门大学等20多所知名高校的近50位师生参与,濂头村也是目的地之一。“这个地点现在还能找到吗?”“这个土名指代哪里?”……在濂头村献宝厝,学者们对从契约中筛选出



宋怡明(左)、郑振满(中)研究濂头村的文书。通讯员 张培春摄

的地名,围着村支书陈秋东孜孜不倦地询问。他们当中有不少人的博士论文正是围绕永泰文书展开。

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岳沁之曾以濂头林家的人情簿为切入点,开展关于清末民初闽东乡民的人情往来及其人际关系的研究。“可以说文献收集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多亏了村委会和村民的照拂,将宽敞的村部会议室专门留给我们工作,还有村民亲自将成箱的文书搬到村部,约好哪天来取就任凭我们处置。”村民的热情回应让岳沁之感动不已。

学者们纷至沓来,令人不禁想问,民间文献研究对当下的乡村建设有什么助益。

“旅游开发并非评判一个地方发展的唯一标准。‘文字下乡’并未取代口头文化传统,我们之所以要去田野调查,目的就是帮助地方重建文献系统,从整体史视野恢复地方传统,让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智慧在新时代找到新的价值。”宋怡明说。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如今,宋怡明与濂头村、永泰的故事还在继续,我们期待看到一个独特视角下的中国乡村社会历史图景。